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何洛先生学术成就及影响评述

李昕揆

JRUCWP2024009

2024. 01. 29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何洛先生学术成就及影响评述

李昕揆

何洛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教育家、翻译家。在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何洛先生出生入死、努力奋斗，授业解惑、巨笔如椽。他坚贞不渝地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展开斗争，为坚持马列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在形象思维、实践美学、文艺规律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建树，在翻译日本左翼文艺作品和组织译介马列经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创作红色文艺珍品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培养党的革命文艺干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达到“经师”与“人师”的和谐统一。

一、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文论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经师”何洛先生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解决我国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完成了多种研究性论著；积极配合宣传教育和文艺上的争鸣，写了许多批驳错误文艺思想的文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何洛先生积极参加“形象思维”论争，并在论争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进行了系统思考，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实践与美学》等著作，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1977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随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关于“形象思维”的热烈讨论。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何洛针对文艺界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的错误观点，据理力争，在论争中廓清了文艺理论和美学上的许多问题。他明确提出：有的同志认为“形象思维的基础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根本不能对感性材料进行扬弃，这是对形象思维的误解；反对形象思维的同志指责形象思维是直觉主义，我们认为形象思维有直觉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直觉主义；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不能认识本质的看法，不符合艺术构思的基本过程，我们用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实践论、矛盾论的普遍原理去观察艺术构思的过程，就会发现形象思维认识事物本质时的基本特点。何洛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认识论和实践的观点去探讨和把握形象思维问题，和其他学者一起，不仅启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美学热”，也推动了文学界种种创作方法的新探索，繁荣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何洛领衔编著被誉为“实践美学”代表作之一的《实践与美学》一书，推动了“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文艺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说 20 世纪前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成就是把唯物主义反映论引入美学理论进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话，那么 20 世纪下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建立了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在对反映论美学原理的机械论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 20

作者：李昕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lixinkui@ruc.edu.cn。

* 本刊“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何洛致敬。

世纪所达到的新高度。这部以实践观点为主线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著作，围绕美学史上的实践观点、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美论和美感论、艺术审美实践认识规律的形象思维问题等方面，集中探讨了实践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何洛先生在书中提供、呼吁、倡导了一系列真切地切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命题和思想，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支撑。

二、所译著作作为革命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滋养

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对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且取得了较大成绩的工作，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何洛在这项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对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双壁”之一的《没有太阳的街》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等的论著的译介和引入，既从创作上弥补了我国当时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精品的稀缺状况，也为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滋养。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印刷工人作家德永直以自己参加印刷工人大罢工的经历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的新成就。小说于 1929 年发表后立即在日本文坛引起轰动，后在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我国于 1931 年、1956 年、1958 年、1985 年先后出版过四个不同译本。其中，由何洛翻译、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蒋光慈介绍、于 1931 年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译本，既是首个中文译本，也是国际上首个外语译本。何洛因此被誉为翻译《没有太阳的街》的“第一人”。20 世纪 30 年代初，我国工人运动浪潮此起彼伏，但反映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高质量长篇小说作品在当时还十分罕见。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第一部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蒋光慈，1926），固然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内容大量袭自当时的报章记事，又让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形成对照的是，德永直在描绘工人斗争的宏大场面方面所表现出的驾驭大场景的艺术功力，以及以电影手法连接、转换场面所展现出的高超艺术手法，是当时国内表现工人运动的作品中所缺乏的，这是蒋光慈倾心推荐这部作品在国内出版的重要原因。

当时我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日本文论家如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川口浩等人的论著，曾被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典范而被大量引入我国。何洛在这方面作出过自己贡献，他在陈望道办的《太白》月刊上，发表过多篇翻译藏原惟人等的文艺理论文章，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当时在延安能读到的马列经典著作极为稀缺，中国共产党遂在延安专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大学——马列学院内成立以翻译马列经典为主要任务的编译部。张闻天任编译部主任，何洛任编译部日文组组长。编译部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马列著作编译出版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包括何洛先生在内的众多编译工作者们不畏艰难、不辱使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马列学院编辑部是党中央正式组建的首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

三、所创作品堪称红色文艺珍品

在文艺创作方面，何洛先生横跨戏剧、人物传记、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标志性文艺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字里行间全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感，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好山河的真挚热爱，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延安时期，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何洛执笔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接皇军》。话剧展现了维持会长一家为迎接皇军到来，做了许多烦琐的准备，当他们听到爆竹声响起全家出动时，令他们

尴尬的是，开进镇里的已是刚刚消灭了皇军的八路军指战员。这出戏产生了类似于果戈里《钦差大臣》那般的喜剧效果，得到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认可。那个时期，何洛还创作过活报剧《阶级塔》等，演出后也得到了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

1958年，何洛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记述劳动模范李凤莲一生的人物传记作品《李凤莲》。在这部人物传记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看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和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而且人物传记作为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李凤莲》中关于提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李凤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开国大典时，忽然想起前两天一位中央首长跟她说的话：“为了建设新中国，不提高文化技术不行，可能很快就要成立一个专为工农开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送你到这个大学去学习好不好？”第二年的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1号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它的创办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国家迎来了建设的新时期，何洛再次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结集于1989年、于1992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潮声集》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心声。《潮声集》包括重光、悼念、赞颂、欢庆、赠友、旅游及纪念、回忆等多方面内容，每件作品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何洛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本色、胆识才华和美好情操。比如，写于1978年的《人民大学复校抒怀》，抒发了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终得返京复校的欣喜之情；写于1984年的“一代贤师表，马列教化真，痛悼哲人逝，永怀晓钟声”诗句，表达了对成仿吾老校长的哀悼和铭感教泽之心；为悼念曹瑛而写的《铮铮铁骨 大公无私》一文，追忆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共同经历的狱中斗争和考验；《北京颂》则是作者在新中国经过40年风风雨雨后的光辉成就面前，发自内心的激扬赞歌。何洛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豁达乐观的美德和对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赤诚、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者，其作品不愧为红色文艺珍品。

四、培养大量文艺人才，堪称文艺教育家典范

“人师”何洛先生更是知名的文艺教育家，在半个多月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都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教育事业。他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工作，长期担任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在培养党的革命文艺干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从1937年调至马列学院编译部任日文组组长，何洛开始担任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并自此投身于文化教育和文学教学工作。从延安鲁艺到随华北联大进入晋察冀边区任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从1946年从北平军调处调回华北联大任文学系的主讲教员兼党的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大学二分部主任，从1959年参与创办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班”到1960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无论是在延安鲁艺、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人大文研班还是人大语文系，何洛先生不仅走向教学第一线，亲自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文学概论”“马列文论”等课程，而且大力邀请全国知名文艺理论家为同学们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他经常关心同学们的课余活动，带头撰写学习《讲话》等体会，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提供方法上的示范；他特别善于引导学生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既注重对深厚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又注重对探索和解决文艺问题的实践能力的提升，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和传统，为我国文教战线培养了大量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华大文学系、人大文研班和语文系的毕业生们，近几十年来

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批出自何洛教授门下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因感念老师的培育而称他为“恩师”。

从翻译日本左翼文艺作品和马列经典到取得多方面的学术建树，从积极配合文艺战线上的争鸣到创作出大量红色文艺珍品，从烽火办学的战时教育者到新中国培养出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何洛始终坚守文化战线，站定教育讲坛，乐育革命英才，做到了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不愧为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